

五華文史

第十五輯



政协广东省五华县文史研究委员会编

五 华 文 史

第15辑

政协广东省五华县文史研究委员会编

玉日休
玉冬
共河入
海流
龍宮子
里目
更已
春樓

政协委员温兆元书

唐詩名及通泰詩人

王玄暉詩作佳話

一九八一年冬月 兆元書

目 录

土改杂忆及其它.....	辛 子 (1)
魏国源同志传略.....	家 彦 (13)
古大存在东北.....	黄舜兴 (18)
书魂——研读廖蕴玉书法感言.....	廖子梅 (33)
五华古代乡土述略.....	宋占群 (37)
粤东明珠七目嶂.....	陈启鹏 (67)
陈芷孙重逢花烛唱和录.....	廖世炎 (70)
棉洋平安村扮古事.....	谢木乡 (91)
钟生妙对叶秀才.....	廖世炎 (95)
薛特拔中举拟联.....	魏东海 (96)
荧屏观感.....	张映乾 (97)
我的父亲徐文征.....	徐建玲 (98)
白发吟.....	李庆焜 (103)
五华古塔概况.....	李雄坤 (105)
关于弼诚的辩伪.....	廖传扬 (116)

土改杂忆及其它

辛 子

县政协文史办约我写点文史资料，并嘱咐可以写建国后各个运动的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我参加过土改运动，就写土改中自己的一些经历和见闻吧。因为它不成体系，故题为“土改杂忆及其它”

五华的整个土改运动，在1952年冬县委召开的五华县第六次土改干部（扩大）会议上，县委书记曾定石同志曾作了初步总结。他指出五华县的土改可以分三个时期：1951年4月至8月，是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八字运动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51年9月至1952年7月是总结教训，收缩阵地，整顿干部队伍搞试点、重点时期。第三个时期是从1952年8月至12月，是全面铺开土改与分配土地时期。如果加上土改复查（从1953年1月至5月）就是四个时期，共有二年多的时间。

从1951年1月至1953年4月这个期间，我曾先后任过乡

农会长、代乡长、土改工作组副组长、组长和单元土改队长、复查工作组长、队长等职务。

土地改革是要消灭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摧毁国民党在农村反动统治的基础，实现耕者有其田，解放农村生产力。真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是一场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伟大群众运动。对干部来说确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群众路线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大多数干部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也有极少数被这滚滚洪流所淘汰的。现在我讲一些土改运动的片断，说得不对的，请参加过土改的同志和研究土改工作的同志批评指正。

“你想搞共产，不记得民国18年？”

对于土改，有人欢喜，有人愁。那些地主老财们不少人是希望“变天”的，即希望国民党重新上台。他们抓住刚解放不久，农民还没有深刻认识共产党的政策的时候，大肆恐吓欲起来要求减租减息，分配土改的贫农。他们散布说：“你想搞共产，不记得民国18年？”土改开始的时候，农村中许多贫苦的农民，真不敢接近土改工作队员，怕惹来是非。害怕民国18年惨剧的重演。

民国18年怎么叫人如此害怕呢？参加了土改我才有比较深刻的了解。那确实是乌天暗日十分使人恐怖的年月。那时五华县的农民运动正处于低潮时期，蒋介石派黄旭初师来五华镇压古大存领导的革命农民运动，黄旭初与地反头目张九华勾结，在五华实行了“三光”政策，大肆滥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据五华县志记载，从1925年至1931年期间（即民国14年至民国20年）五华县被杀害的干部群众就有3000多人，其中干部1196人，被烧毁的民房有10327间，被逼卖妇女292人，被抢耕牛4221头。有优坑等14个村几乎被夷为废墟。

我曾经参加过周潭三河村的贫雇农诉苦会，他们声泪俱下，（有的甚至昏倒了）控诉当时反动派的罪行，哪些反动家伙，杀人的时候，有的先砸10个手指，10脚趾；有的用竹签插入喉咙，有的还将竹扁担插入妇女阴部，弄得人死去活来，才去枪杀。被害家属被洗劫一空，他们走后拈烂水缸块，在露天煮食，他们也要把它砸烂，人非木石听了真是胆寒落泪和怒发冲冠。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周江有一个溪口村，52户人家，289人，有29位青年汉子，参加古大存同志在梅林梅岗寺召开的农民武装大会，回来后，与反动派的镇压进行了坚

决的斗争。反动土豪郑宏石（土改时被处决了）勾结黄旭初部队对该村进行了“围剿”整个村被打得稀烂，被杀死36人，受伤10人。1951年，我到该村时，看到留下的残垣断壁，仍弹痕处处，光景十分悲凉。

土改运动中，除耐心细致做引导贫苦农民进行回忆诉苦外，县里（有些区如长布等）还组织人员上演《白毛女》、《赤叶河》等剧目。每一场演出都变成了贫农的诉苦会，看到白毛女受苦的形象广大农民引起共鸣，边看戏边流泪，哭声起伏此起彼伏，整个剧场变成了控诉剥削阶级的大会。

诉苦会，确是提高群众和干部觉悟的一种好形式。许多原来害怕的农民，一经参加诉苦会，他们就会提高阶级的觉悟，认识到不消灭剥削，不消灭剥削阶级，农民就没有出头、当家作主的一天。就会起来紧跟党走，为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斗争。

“把他们统统枪毙！”

1951年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八字运动中，曾经逮捕了一批土豪、敌伪人员。各地要召开农民代表会议，进行“定罪量刑”我记得在某乡一次会上，由于群众是苦大仇深，加上“镇反”政策还没深入人心。讨论“定罪量刑”的

时候，几乎对个个被扣押的人都认为必须“枪毙”。当然，党和政府不会走群众尾巴，十分明白，这是群众中感情用事的“左”倾思潮。同年10月县委遵照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引导干部、群众注意掌握政策，使他们认识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道理。使干部、群众明白要杀的只是那些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首恶分子。并严格执行了“可捕可不捕，不捕，可杀可不杀，不杀的政策”。使镇反运动健康发展，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政权，扫除了土改的障碍。

回顾一下，群众运动确实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文质彬彬的事情，斗争激烈，情况复杂。后来也发现有极其个别的是杀错了。被杀错的，一经发现，党和政府都实事求是地为他们平了反，恢复了他们的声誉。这个实事求是的政策，也得到了他们家属的理解。说明党和政府对执行政策的严肃性和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对“春耕整队”的印象

按照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指导思想，整顿好干部队伍是完成土改的关键。从1951年至1952年的土改运动中，对土改工作队进行过多次整顿。1952年的

“春耕整队”是留给人们最深刻记忆的一次整队。

1952年三、四月间在兴梅地委领导下，在梅县召开了有县、区领导和部分土改队、组长参加的会议，被称为“春耕整队”。当时我是面上乡的工作组长，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那次整队的严厉，我是后来才知道的。那次会几乎撤掉了县、区的地方领导干部。我们的区委书记张俊乔，区委张超伦等也被撤掉了。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张俊乔、张超伦同志被撤后，组织上竟把他们分配到我领导的土改队来了。昨天他们还是我的顶头上司，今天却变成了我的部下，真是天有不测的风云。怎么领导他们呢？费尽了心思。

经过考虑，张超伦同志身强力壮，是个文化人，便安排他到一个村任组长，张俊乔同志满身是病，但他来了，也得叫他先下去。然后才想办法安排。

过了二天，我便去看望张俊乔同志，见他脚部浮肿，面部有点虚。我征求他的意见：您回去休养吧？他也怀疑，能否批准？回来后，我郑重其事向区委作了汇报请示，提出：

“张俊乔同志有病，下乡工作不了，是否让他先治病？”。不久，县委通知张俊乔回县休养，治疗。我心里才放下了一块大石板。

后来，张书记落实了政策，重新走上领导工作岗位，出任中学校长。此事，他每每对我谈及，并对我表示感谢，我告诉他，这是党的干部政策，没有什么好感谢的。

从这些事实中，就可窥见当时的“春耕整队”是打击面很宽，是没有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政策，严重伤害了干部的积极性。

“三同”趣闻

土改在广大的农村进行，时间短，任务紧，需要大量的干部参加，土改工作队的成员来自上上下下，四面八方。有南下大军，有城市下乡的知识分子，也有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是首次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使他们遇到了许多陌生的问题，也就不免闹出许多趣闻。

“芋子连皮吃”。这个故事在当时流传很广，究竟什么人，谁也不知道。听说有一个下乡的土改队员，在农民家里吃饭，农民在冬天中午一般吃蒸蕃薯，他们吃蕃薯是不剥皮吃的，而那位队员却剥皮吃，情况反映到队上，队长在会上指出：“下乡要有群众观点，怎么吃蕃薯还剥皮呢？”那位同志听到队长的批评，虽然，没有指名道姓，自己却也记在

心里。回到农民家，第二天农民蒸了芋头来吃，他不敢剥皮，便连芋毛也吃进去，真是吃得够苦。芋子连皮吃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

“吃山汤叶板，要糖”。土改时，农民还很苦，特别又是贫雇农，到了四月便闹春荒，工作队员住在农民家里，农民吃什么，自己就吃什么。荒月农民有的上山挖土茯苓，有的采山汤叶来充饥。

说起山汤叶，它的气味又难闻，味道辣中带臭味，难吃极了。有一次农民采了山汤叶，把它晒干，做成一个一个板子，给工作同志吃，那位同志硬着头皮，怎么也吞不下，问农民，有没有糖？弄得“三同”户十分难堪。买米的钱都没有，那里还有钱买糖呢。从这里便可窥见当时农民的生活和下乡艰苦的情景了。

“南下大军与地方干部团结起来”

南下大军和南下干部，是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部署，来支援广东土改的，来我县的人数是一个营级单位，大概三百人左右吧。带队是宋贺庆同志，根据来到我队的大军同志的表现，除了语言不通外，他们立扬坚决，爱憎分明，工作十分负责，作风正派，劳动观念极强，我对他们的印象是好

的。地方干部很敬佩他们。群众拥戴他们。

南下大军与地方干部总的说来是团结的，但也发生过一些矛盾。其中一次影响最不好的是张区书打民兵的事。

1951年九月，县召开土改干部大会，当时县治在华城。当时的华城，是一个小镇，机关都分散在祠堂里办公。开大会除住学宫外，并无其他地方，那时治安比较差，县人民武装部为保证会议人员的安全，住地都派了民兵站岗。有一天傍晚，有一位南下大军在长布任区委书记的张某某，到外面洗澡回来，在进学宫大门民兵岗哨时，骑自行车进入，被民兵拦住，叫他下车。那位书记不讲理，对民兵就是一拳打过去。使那位民兵大吵大闹、嚎啕大哭。

这件事情传出后，县武装部和地方干部认为大军打人不对，非常气愤，要求县委处分打人的人。而有些南下大军便认为打个民兵有什么了不起，何必如此气势汹汹？因此，一时气氛十分紧张。在这关键时刻，曾定石同志从地区开会回来了。

曾定石是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的军队干部，又是揭西县人，也可以说是地方干部，他地位又是团政委，又是县委书记。所以他就能驾驭风云。他回来后即召开县委领导开会正确做出决定。

翌日，召开全体干部会议，曾定石同志宣布了县委决定：对打人的张书记停职检查，另派一位地方干部出任区委书记。与此同时亦严肃地批评了一些地方干部，不识大体，不顾全大局的讲法和做法，这样在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基础上，使南下大军和地方干部团结起来了。为顺利开展土改运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我把这件事写出来的目的，说明不怕有矛盾，只怕没有正确的方法去处理。只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人民内部的矛盾，总是可以解决的。只有实行“五湖四海”的干部政策，团结起来，才能完成繁重的革命任务。

其 它

（一）

对于执行华侨政策的问题。从我的记忆里，在土改中要保护华侨的财产，保护工商业等的政策是几乎没有听到过传达。因此，在划阶级的时候把有的华侨的家庭划为华侨地主、工商业地主等。我一直到八十年代落实华侨房产政策时，我才明白，中央在土改中有关于保护华侨财产的政策。因为土改中没执行好中央对华侨的政策，以致对华侨、港、

澳同胞的积极性造成极大的损伤，并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带来了许多麻烦。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二）

土改的好处，在土改后逐步表现出来，因为我土改在农村，土改后直到合作化高潮我仍在农村。土改后我常到原来的“三同”户家里走走，农民可高兴了，煮了很多饭、菜。吃饭的时候，老是怕我们吃得少，他说过去用小铁煲煮饭，现在我们用大锅煮饭了，饭煮好装在一个大的饭甑里，有客人来随时可以吃饭，说明土改，农民分了田地积极性是提高了，生产力发展了，生活改善了。土改后社会秩序也很好，农村真正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此外，农民踊跃交公粮，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政府在各地建了许多粮仓。这些都是很明显的社会效果。

（三）

如何对待土改运动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只有坚持这个方针，才能正确对待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各种政治运动。我记得1983年，到香港会见从台湾来的胞兄，我大哥在香港有许多朋友，都热情宴情，我亦陪他参加宴会。他的朋友中很多是从大陆逃过去的地主、反革命、富农、坏分子的家属。

吃饭的时候他知道我是内地去的，他们便问我：“我们都是四伯公的儿女，你敢和我一起吃饭吗？”弄得一桌的客人都笑了起来。大家在笑声里得到了理解，今天我们已捐弃前嫌，团结一致向前看，为祖国繁荣，统一而奋斗了。

可是我也遇见过二位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的香港人和内地人，有的问我，你说地主剥削了你是吗？另一位当面对我说，那次清点我财产的时候，你也参加了？（其实不是我）。他们的问话引起了我的沉思：这些人是对历史的无知还是怀有那个……？，我想着脑海里浮现了孙中山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三）

魏国源同志传略

家彦

革命烈士魏远明（1901—1928），又名定邦，五华县横陂镇夏阜村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两次随国民革命军东征陈炯明叛军。在攻打淡水、惠州之役，他身先士卒，勇敢杀敌，由排长升为连党代表。1926年，他又随东路第一军北伐，只几个月，势如破竹，便把盘据闽、浙、赣等东南五省军阀孙传芳打倒，升为团党代表。1927年“4·12”政变，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员，脱离第一军（第一军原是蒋介石嫡系），回到广州参加张大雷、叶剑英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回原籍五华，在古大存同志领导下，开展农民运动。1928年因受大批反动军队围剿，被迫退至八乡山牛汶溪，又因叛徒告密被捕。这时，原是中学时代的好同学、水寨沙渴人张绍璜闻知，心急如焚，四处托人奔走营救，并吩咐其妻李菊娣前往探视，远明自知营救绝无效果，对李菊娣说：“我为革命而死，毫无遗憾，只望你和绍璜念我情同手足，